

利瑪竇神父來華四百周年

教宗在紀念會上發表演詞

今年十月廿五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親臨羅馬宗座額我略大學，出席紀念利瑪竇神父抵華四百周年學術研討會的閉幕儀式，且在會中發表演講。現根據《信德》通訊社十一月六日所發表的英文稿，把該演詞譯成中文，以饗讀者。

教宗在讚譽了瑪薩拉達及額我略大學的籌備委員的推動工作後，演講如下：

利瑪竇神父是中國與歐洲兩大文明之間的橋樑

除了瑪薩拉達和羅瑪兩個城市外，北京與利瑪竇亦有着特殊密切的關係。這位偉大的人文主義者及傳教士曾在此城展開工作，效果超著；他的墓地亦在此城，受歷代中國人看管和尊崇。

一五五二年十二月，耶穌會士方濟各沙勿略死於一個可以瞭望到偉大中國的小島上，死時只有四十七歲。但三十年後，同會兄弟利瑪竇抵達中國，把他未竟之志實現，達到高峰。而利瑪竇，這位未來的中國傳教士，是在壯志未酬的方濟各死前不及兩個月，生於瑪薩拉達城。為了追隨方濟各，他進入中國，贏取中國人民的愛戴，使他在中國文化歷史上佔一席位。

雖然在數世紀前已有另一些歐洲人，如馬哥勃羅和方濟各會士孟高味諾及柏郎嘉賓接觸過中國，但是利瑪竇首先成功地把自己浸潤在充滿生機的中國文化和社會體制中，使這個偉大國家中很多人認識歐洲的科技，亦同樣地使西方熟悉中國人的文明及文化光華。

利瑪竇神父是一位真正的人文主義者，他的神、哲學和藝術修養深厚，對當代高級數學、天文、地理和最進步的實用科技也很有心得，再加上他以堅忍不拔和謙恭好學的態度，深入鑽研中國古典文化，因而真正成為中國與歐洲兩大文明之間的「橋樑」。

他那種溝通文化的工作，至今仍留下重要的成果，包括：在其門生（特別是徐光啓和李之藻）聰明和大力協助下所出版的很多中文著作，他（和他的中國友好）把科技輸入中國和使中國現代化的貢獻，他用意文介紹中國文化各方面的資料和信札。

特別由於他這些十分有意義的中介工作，中國人民在他們的歷史上，為這位瑪薩拉達的偉大人道主義者及傳教士保留一席重要位置。

從事本色化工作，投身社會作見証

這麼大價值的貢獻，需要付出長遠時間和殫心竭力去準備，及逐步融會於中國文化中。爲此，利瑪竇不惜犧牲，積極學習中國語言、風俗習慣，使它們變成自己本國的一樣。難怪他的同伴羅明堅神父在他的一封信上說：「我們爲了替基督賺取中國，都變成中國人了。」

一五八二年，當利瑪竇抵達澳門，即被派往中國南部的肇慶，他在那裏不斷學習，累積經驗，反省文化實況，以備傳教之用。經過二十四年漫長耐心的鍛鍊，終於得償所願，於一六〇一年到達中國的心臟——北京。直到一六一〇年去世爲止，這九年間，他勤奮努力播下的種子，獲得了令人喜悅的成果。

初時，利瑪竇也和其他傳教士一般，設法仿效僧人，穿僧服，打進僧人階層，因爲他深信，這樣做才能被視作「宗教人士」。其後，他才發覺，其居住四週環境所表現的宗教觀念，與在西方的截然不同：僧人實際就是活在社會邊緣的人士，連他們的廟宇平常也建築於僻遠之地，隔離人群。

利瑪竇與他的同伴們，爲了深入社會作信仰見證，改而接受了儒士的生活方式，與他們打成一片。他們這樣做，是要使人明白，宗教信仰並不導人遠離社會，却叫人投入世界，促進社會生活，向基督救恩及教會的恩寵生活開放。

科學方面的貢獻及入世式的傳福音

正如這次研討會所清楚闡釋的，利神父欲首先爲中國人打開一條推進科學的穩固道路，遂嘗試把歐幾里得幾何譯成中文。這是西方給予中國的一項寶貴貢獻。但明顯地，這位瑪薩拉達人心中另有目標，他追尋這些目標時，並沒有忽略對聽衆抱有深深的尊重。講解福音時，他懂得如何找出一個適合聽衆又合符文化的方式。他開始時，先與中國人討論一些他們所重視的問題，比如：儒家傳統的道德修養及社會倫常，他自己所仰慕的人性和倫理價值。之後，很謹慎及間接地向他們介紹基督徒對不同問題及事物的觀點。因此，在沒有勉強或控制別人的態度下，他最後導引不少聽衆認識及崇拜萬善真源——天主。

這樣一個訊息，如此具體及充滿希望，同時亦如此尊重中國古典思想的積極價值，不但他的門生懂得，而且他的無數朋友和訪客亦領悟。由於努力從事本色化工作，利神父在中國友好協助下，完成了一件似乎不可能的工作：就是把天主教神學和禮儀術語譯成中文。所以，他創造了認識天主的條件，使福音喜訊和教會降生在中國文化的土壤上。

爲福音生活及爲中國道德作見証

利瑪竇神父的本色化工作，並不止於傳教意識及傳教工作上，也及於個人生活。這裏我們要特別指出，他的卓越不凡的宗教生活有效地使門下受業及交往的人接納他的講道。

由於深信中國文化看重和靄友善的談吐和交往，視之為心靈柔順的表現，故此利氏千方百計，尤其是在接待登門求見的訪客時，修養這些美德。川流不息的造訪，往往使傳教士，尤其是精通中國語文及文化的利瑪竇神父，付出很多時間和很大犧牲。循着此種交友方式的路線，他繙譯了西塞祿的「交友論」，並把它獻給自己的聽眾。

還有值得一提的，是他贏得士大夫和朝庭官員的尊敬與友誼的非凡本領；這些人士他日屢屢透過官職之便，進一步把福音及傳教士的工作擴散到中國各地。

利氏傳教工作開始時，便深悟到這是進入一個荆棘滿途的冒險嚐試。最使他難堪的，是他嶄新的傳教方法招致在澳門一些兄弟的誤解和猜疑。經驗告訴他，在時機仍未成熟時，他懷着謙虛及信賴上主的心情，去修訂工作方法及自己的意見。

利氏對傳教及執行傳教任務的意義非常清晰，他堅信自己不是進行純屬個人的工作，而是依照修會憲章規定，執行宗座藉耶穌會長上委派的任務。

這是一項關鍵性的因素，特別能使他的傳教工作果實豐盈，給予他克服困難及沮喪的力量，亦能防止他犯錯誤、自我孤立或固執己見，以致減弱傳教效力。

使福音與中國的價值觀水乳交融

利氏及其同伴由個人的本色化，很自然地便演進為福音訊息本色化的境界。對於教會傳教工作本色化這個重要課題，我本人曾多次強調。

一九八一年二月本人在馬尼拉向亞洲中國團體代表講話時曾說：「教會從早期開始，就知道透過不同民族的思想和文化的幫助，表現基督的真理，因為教會傳播福音的對象，是各國的人民。基督的福音並不是某一群或某一民族專有，而是屬於每一個人的。」（一九八一年二月十八日第四節）

無可置疑，利瑪竇神父的工作既艱辛吃力，也崇高無比，尤其是當人們想到中國文明及文化，不但躋身全球最負盛名與歷史悠久者之列；而且在思想、語言、文字表達以及傳統習慣上，獨創一格，成為全球歷史上最充份發揮知識及人性價值的中心之一。

我們不難想像利氏感到肩負重任，與早期教會的哲學家兼殉道者聖猶斯定、亞歷山大城的格肋孟及奧利根在努力把信仰的訊息翻譯成當代文化界能懂的術語時，所感到的重任不分伯仲。

正如教父們對希臘文化所持的態度，利氏不偏不倚地堅信在基督內的信仰，不但不會使中國文化受損，反而使它更豐盛完美。他的中國籍門生中，有些成為朝廷中的大官，這些人深信，接納基督的信仰，絕非要背棄自己的文化，或削弱對國家及傳統的忠誠，却促使他們為祖國獻出更豐富及更有水準的服務。

誠懇和切身的服務

利瑪竇來華四百年後，他的形象及所遺下的功業，對今日正在努力推行現代化的中國人

顯得正合時宜。為中國而言，其民族的人性及文化價值的基本統一，愈來愈彰顯於普世；海外所有華僑也承認這項統一。教會既然敏於理解每個國家精神方面的恩賜，則不能不注視到全球人口最多的中國人民是一個統一的實體，也是一個擁有崇高傳統及生命活力的融合體，所以它同時被視為一個偉大及富有前途的希望。

利瑪竇的科學工作在中國備受推崇的地方，在於他的謙虛、忠誠和無私的態度，不是出於別有用心，也沒有跟任何外國經濟或軍事力量搭上關係。

在梵二大公會議特有的開放及交談的氣氛下，利氏的傳教方法顯得更有活力和實際。《教會傳教工作法令》在描述基督徒應有的態度時，對此點已有暗示，它說：

「為使基督徒能夠有效地提供基督的見證，他們應該以謙敬仁愛和別人聯合在一起，應該承認自己是共同相處的人群的一份子，應該藉着人類生活的各種事業與關係，參加文化與社會活動，應該熟悉地方的風俗及宗教傳統，應該以欣然起敬的態度，去發掘蘊藏在這些事物中聖道的種子……」（《教會傳教工作法令》第十一節）

利氏承受由先祖傳下來的信仰，且將它傳給另一個遙遠的國度。他把自己從這所額我略大學所學得的學術帶到那個地方，獻給一個富有高度道德傳統及高尚文化的民族。同樣，他的傳揚福音的方法，亦使教會透過如此高尚可貴的不同文化因素，更為豐裕。

利氏成功地築起一座溝通教會與中國文化的橋樑，儘管困難和誤解曾在過去出現，甚至直到現在仍然發生，但這座橋樑仍然安全穩固。本人堅信教會正以大無畏的精神，朝着這條途徑走向未來。

我們有信心能消除障礙，並能找到適當的方法及妥善結構去恢復交談，也使交談時常保持。這樣，所有中國信友，無論在國家內或教會內，都能安心。我們相信這將使整個備受教會尊崇及敬愛的中國得益。

利瑪竇之墓發出交談與合作的呼籲

利瑪竇身故後，遺體安葬在北京，葬地是皇帝所御賜。當時的宰相有感於這史無前例之舉說：「在中國歷史上，來華之西士中，從未有人如利公之才德出衆。」

除了御賜葬地外，皇帝亦賜地予耶穌會士興建會院和教堂，藉此保護在華的天主教，俾能安心繼續工作。

希望耶穌會為這位卓越的成員的善表所鼓舞及啟發，在聖神不可思議的引領下，為中國人民的文化及傳福音工作，作出有效的貢獻。利瑪竇在北京的墳墓有如埋在地下深處的麥種，等待結出豐碩的果實。它向羅瑪及北京發出扣人心弦的呼籲，邀請它們重新展開他在四百年前以無比愛心及成就所開始了的交談。

本人懇請你們各位不斷祈禱，增強及支持這個殷切的願望。現在本人頒給你們宗座的特別遐福。